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发表了许许多多的论著，举办了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从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探究。特别是重点回顾了70年来的史学成绩、总结了好的经验做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文章，进行简要介绍。

201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 王富聪

全方位总结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成果

回顾了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历程。陈锋的《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罗敏的《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回顾了民国史从确立逐渐走向成熟，提出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崔志海的《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提出晚清政治史在过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理论与、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

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王建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瞿林东的《探索史学历史 促进史学发展——新中国70年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认为，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 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月异 的态势。戴逸的《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 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

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马克垚的《70年砥砺前行 的中国世界史学科》提出，世界史学者应当从社会中学习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既要百川汇海，也要在一定领域力求专精，深入钻研，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努力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马敏的《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新中国史学发展70年的一个侧面》认为，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高士华的《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抗日战争研究七十年来跌宕起伏，曲折前行，收获颇丰。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加快构建抗日战争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朱汉国的《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指出，70年来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

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 断探索和创新等。

新的研究视角蔚然成风，出现了“身体转向”“动物转向”“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 身体史研究得到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唐棣宣、吴光会《身体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视角》等。人与动物关系史得到较大发展，沈宇斌的《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指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王立新的《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提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最强劲的学术潮流，引入该方法可以让研究者更加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史学、跨国史的思想、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的输入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考察民国历史上的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丰富和深化对民国历史的阐释。

义的正式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规律”不仅完成了自身的彻底转义，并在与其他相关词语的比较中取得优势地位，成为表述“客观性”“必然性”最常用的术语。黄兴涛、陈鹏的《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论述了“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李里峰的《“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认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任吉东的《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通过对“苦力”进行考察，认为“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

关于话语研究。黄兴涛的《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指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权”，在清末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但五四运动及其后，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反帝的话语武器。涉及话语研究的此外还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等。

关于报刊史研究。在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洪煜、符晓林的《权力文化视阈下的近代上海报纸组织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近代上海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政府权力逐渐渗透到报贩组织中，报贩组织的性质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报贩行业组织也从一民间行业组织逐渐成为受政府控制的准官方行业组织。

关于晚清政治研究。翁有为的《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刍议》指出，结束割据和战乱状态，实现和平与统一之道，历史选择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军阀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历史大势及其历史性之破题。刘晨的《太平天国乡官政治再研究——以乡官群体为中心》分析了1860年代太平天国231位乡官构成的乡官群体。

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拓宽新领域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武力、李扬的《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和辉煌成就》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结合中国国情、阶段性任务和 国际形势，不断推动各项经济制度和 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这个基本特点在完善所有制结构、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以及改革对外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朱汉国的《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于财政和金融史研究。任智勇的《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指出，到1853年，因河工和太平天国战争产生的巨额另案经费近3000万两，清政府财政自此已无力维持。户部推出的各种补救措施中，以征收商业税和金融改革影响最大。商税的征收失败导致清政府此后在商业性税收方面除厘金外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厘金也因此承担了恶名；金融方面推出的铸大钱、行钞因未顾及信用问题和细节考虑不周导致失败，并影响了此后中国纸币的推出与金融控制权的旁落。

城市史研究佳作频现。王笛的《“茶博士”：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别冲突》认为，茶馆是展现抗战时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社交网络和地方政治的最好窗口，职场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成都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与女茶房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都映射出茶馆工人们的 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

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蔡禹龙的《近代中国发网手工业的兴衰（1900—1937）——基于山东省的考察》认为，中国近代发网手工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通过对外贸易出口的方式促进了中国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妇女提供了谋生的途径。

重视环境史视角。高元杰的《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认为，河工物料从柳束到林秸的转变，既反映了河工对林木植被的沉重压力，也是黄、运二河改造下的农业环境适合高粱广泛种植的条件使然。河工用秸一方面提高和巩固了高粱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比例，另一方面造成了民间燃料和肥料的短缺，加剧了民众的乱砍滥伐以及对山野植被的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危害农业生产。张莉、陆昱君、李屹凯的《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的蝗灾，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该文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

医疗史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马金生的《病人视角与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学界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多从医生的视角出发，对病人的关注度则明显不够，应在尽量扩充和综合使用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致力于历史情境中病患视角和病人能动性的具体呈现与揭示，同时更要积极尝试从生命史角度呈现人们 的身体感知和生命观念及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在关联，从而将医疗史研究纳入生命史的维度。

社会生活史研究热度不减。刘丰祥的《1928—1937年北平大学教授的休闲生活》探讨了大学教授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丁丙的《隐忍的反抗：董毅北平日记中的北平沦陷区生活》指出，沦陷区民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非正式的抗争”以此表现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及对日伪统治的反抗。从微观层面考察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隐藏其中的多种形式的抗争。《民国时期北平的厕所改造》发现，老北京城内催生了一批专门以粪业为生的社会群体，如底层以掏粪为生的“粪夫”，经营粪便生意的“粪商”与“粪闹”。一些大的粪商与粪闹在京城内各自牟利了势力范围即“粪道”，对势力范围内人家的粪便进行收集，从而牟利。

社会治理备受学者关注。江清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认为，1949—1956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对防治蝗灾高度重视，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推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改造蝗区生态环境，使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付海燕的《政府维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指出，近代以来，天津城市乞丐数量激增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乞丐问题，天津市政府除实施传统的救助之策外，还推出一些强制收容和管制的措施。

妇女研究依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黄道炫的《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认为，抗战和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军队和党政干部婚姻实施限制措施。通过惩戒和引导双管齐下的管控，这一措施实施堪称平稳，没有激起大的波澜。在政治权力强力推进的过程中，婚恋意外成为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碰撞与交融的着力点之一。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严海建的《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认为，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一代有一代之视野、理论、方法。历史研究的创新有待于研究范式的转换、视角的扩展、相关理论的指导、史料的扩充。回顾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热点研究，史学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学术机构、刊物和学者不断涌现，在史料文献发掘整理、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路径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历史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从理论、体系上创新还不够薄弱，和一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展望新的一年，如何推陈出新，加快构建历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使命。期待史学工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借鉴。

五四运动成为思想史研究热点

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五四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近代新思想、新观念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探讨。耿云志的《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治革命的新起点。杨念群的《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认为，“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释逐步退潮。瞿骏《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认为，钱穆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

动。彭姗姗的《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认为，关于杜威访华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响—接受”的框架内展开，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与五四时期的中国都是复杂多元的变量。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马建标的《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程美东的《新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认为五四就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国

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愤意识的激情表达，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通过词汇和概念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演变，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新变化。王士皓的《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认为，“规律”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但是其“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最终确立却只有几十年时间。在古代汉语中，“规律”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制度”。晚清以降，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

《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认为在清末民初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心。刘丽丽、徐振岐的《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舆论界对马占山抗战的形象塑造及影响》认为，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外媒对马占山江桥抗战的高频报道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对促进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起到了一定作用。贾钦涵的《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提出，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针对接吻文化泛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从“礼仪”“卫生”“风化”等层面开展了持久的争论，政府管理者也以维持伦理道德为名，积极干预接吻文化的传播。

识学习的一部分。

关于历史记忆视角。《精神内涵再诠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记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五四运动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财富，其历史记忆绵延至今。五四精神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被赋予诸多层面的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持续宣扬革命精神。“文革”结束后，将“五四”传统定义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新世纪以来，创新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当下，五四精神被进一步凝练和归纳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关于文化和社会形象研究。刘晓琴的

政治史研究求变求新

近年来，随着新的议题和资料的不 断拓展，政治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9年，革命史研究日趋新潮，抗日战争史硕果累累。革命史研究依旧保持较高的热度。在研究内容上，中共制度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黄道炫的《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在革命理论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

落实体系。关于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陈红民的《“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和李金铮的《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先后发表，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为此还开设了“新革命史”专栏进行讨论。从多个层面推动了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反思。

抗日战争史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议题。魏文亨探讨了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人员培训制度，毛光远的《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讨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朱琳的《铁血与合法：抗战时期漫画的空间出版》探究图像表达的民族化与阅读模式的公共化、政治化，如何促发了漫画阅读的普及与接受。黄伟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青年学生救助研究》发现，中共针对沦陷区青年学生的现实状况，不失时机地采取相应措施，救助并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到自己阵营，注意对青年学生开展各种救亡运动。

一些学者探讨了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张仲民的《阎锡山与洪宪帝制》通过揭示阎锡山支持袁世凯背后的内在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以及当时的帝制文化构建情形及其实践效果。指出阎锡

山后来在个人回忆中利用其收藏的来往函电等档案资料，重构了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饰其昔日参与洪宪帝制的行为。提醒当今近代政治史研究过度依赖的所谓档案资料，内中实存在不少陷阱与局限。

关于晚清政治研究。翁有为的《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刍议》指出，结束割据和战乱状态，实现和平与统一之道，历史选择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军阀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历史大势及其历史性之破题。刘晨的《太平天国乡官政治再研究——以乡官群体为中心》分析了1860年代太平天国231位乡官构成的乡官群体。

《新中国70年》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分为探索篇（1949—1978）、改革篇（1978—2012）、强国篇（2012—2019）三个篇章展开论述，涵盖新中国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对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事业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创新中国纪元到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接续书写的历史华章。

《新中国70年》发掘历史作品“不忘前人、激励后人、启迪后人”的作用，对新中国70年间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义道路 的历程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同时对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进行探讨，并对一些规律性认识做出理论概括。

《新中国70年》是国史学界多年来努力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精神贯穿于全部内容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最新认识。在内容起止时间上，是迄今为止涵盖时间最长的新中国史著作，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磅礴历程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在叙述方式上，不仅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而且文风朴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与会专家认为，深入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和国家的历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国史研究，引导学术界、思想界和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认识和高度认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新中国70年》对于进一步推动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文光）



声明：本报（网）所刊作品，未经本报（网）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来稿作者，如未在来稿中特别说明，则视同授予本报（网）将其作品在本报（网）相关媒介终端发表、汇编出版的权利（稿酬不另支付）。

本社址：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政编码：100006 联系电话：（010）85111765 法律顾问：李继泉（北京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人民日报印刷厂承印 定价：每月10.67元 全年128.00元 零售每份：0.8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0143号 广告部电话：（010）65231249

